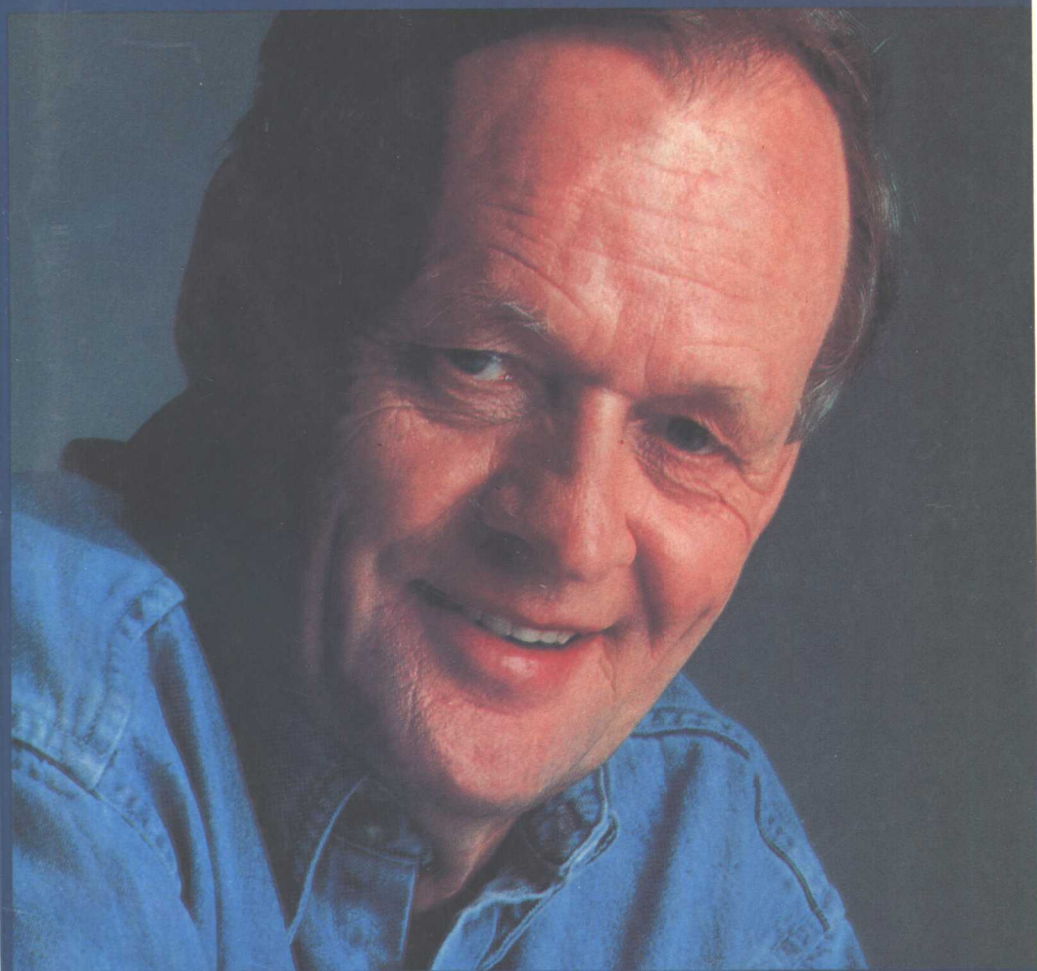


(加拿大)让·克雷蒂安



心中的话

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自传

7.117

知识出版社

心 中 的 话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自传

〔加拿大〕让·克雷蒂安 著

毕 刚 唐中华 等译

张毅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的话: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自传/[加拿大]让·克雷蒂安
(Chrétien, J.)著;毕刚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1

书名原文: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ISBN 7-5012-0733-X

I. 心… I. ①克… ②毕… III. ①让·克雷蒂安
(Chrétien, J.)-传记②政治家-传记-加拿大 IV. K837. 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886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 字数:171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Jean Chrétien

Key Porter Books Limited

Printed and Bound in Canada

Copyright ©1985, 1994 by Jean Chrétien

根据加拿大基·帕特出版公司 1994 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加拿大〕让·克雷蒂安

责任编辑：李豫生

封面设计：孙 敏

封面摄影：菲利浦·兰德雷维利 “C94”

(PHILIPPE LANDREVILLE)

(献给艾琳)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章 酷爱政治	6
第 二 章 学习规则	29
第 三 章 政治商业	54
第 四 章 商业政治	74
第 五 章 走钢丝	94
第 六 章 为加拿大而战	111
第 七 章 对国家的承诺	128
第 八 章 新宪法	150
第 九 章 主要街道——海湾大道	165
第 十 章 暂离政坛	189
第十一章 通向总理官邸的崎岖之路	199
译 后 记	211

前 言

没有任何人会比我让·克雷蒂安更惊讶，我自己居然写了一本书。然而，我毕竟是位政治家而非文人墨客。

写书并非全然是我的主意。1984年自由党政府下台后，我与记者格雷厄姆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1980—1985年加拿大政治的书。当时，比起过去当部长的17年，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我无拘无束、浮想联翩，对当政轶事侃侃而谈。

格雷厄姆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并答应把记录稿送给我。此前，我从未留意将过去的经历加以记录保留，因此我觉得这次录音有助于保存一些记忆并对过去20年间加拿大面临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审视。有一天在多伦多午餐时，格雷厄姆向基·帕特出版公司总裁安娜·帕特提起了这份谈话记录稿。她要求我以这份记录稿为蓝本，写一部关于我的经历和观感的书。过去，我常用讲故事“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让听众发笑。

“夫人，”我回答，“我决不写书，只能让那些自负的人去著书立说，而我的自负感实在是强过头了。”

她说：“您必须写。”

我说：“夫人，我决不写书。因为一个政治家只会写为自己辩护的书，而我不想在别人面前为己辩护。”

她说：“您必须写书。”

我说：“夫人，我决不写书。”

她开了一张支票，我写了一本书。

显然，我是希望用法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正当我在老朋友皮埃尔·加西奥帮助下撰写法文本时，格雷厄姆同意与基·帕特公

司合作担任英文本编辑。两个版本的内容均得益于许多朋友的建议和意见。特别要感谢约翰·雷伊和埃迪·戈登堡，他们花了许多时间与我审核资料；米切尔和珍妮特·夏普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贡献；已故的皮埃尔·热内和兰·米切纳公司的秘书们为出版此书打印初稿；基·帕特出版公司的菲律斯·布鲁斯负责审阅全文，使其文字通顺。由于上述人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鼓励，使我能完成这一写作任务。其中若有错误和疏漏，自然是我的责任。

《心中的话》精装本获得良好反应，令人振奋。尽管我起初也有疑虑，但也曾设想在通常发行1万册就被视为畅销书的国家里，此书会有合乎情理的发行量。当出版界的行家们告诉我，以前政治书籍中的“重磅炸弹”的发行量在7.5万册左右时，我甚至有些想入非非，希望我的书也能进入此列。但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能售出12万册英、法文精装本和13万册平装本。

由于我与不少朋友切磋过写书之事，我发现人们对此有很大的兴趣。“我听说你正用写书来吓唬我们。”一位好友对我说这话时，就像他听到一位冰球运动员计划成为一位花样滑冰运动员那样难以置信。1985年10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心中的话》大型首发式预示着此书出版将获得成功。数百人出席，包括皮埃尔·特鲁多、约翰·特纳、许多自由党前部长以及来自肖维奈恩的朋友和我家庭的全体成员。此书成了当晚电视、电台的全国新闻。第二天早晨各报头版刊登此书消息，继而评论纷至，几乎篇篇评论均肯定此书，我为此感到高兴。多数人认为此书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特别令我欣慰的是，那些读者告诉我：阅读此书就像聆听克雷蒂安在他家里进行坦诚的谈话一样。唯一的反面评论是，有些人认为我还不够刻薄，书中缺乏足够的火药味，说我没有写出“心中的话”。事实上，尽管我可以在书中更详尽地、甚至更聒人听闻地阐述一些细节，但我认为并没有将任何根本性的东西遗漏。偶尔，我会故意省略某人姓名或某一次私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不想无缘无故地羞辱或是报复任何人。不过，这样的省略

也是无关大局的。

我承认，尽管新闻媒体对此书作出好评，但当我为自己公开发行的第一本书签名时，也是很紧张的。那是午餐时间，在渥太华一家书店，我总是在想：“如果没有一个人来买书，我真像个大傻瓜了。”不久，我遇到了一位朋友，他是前公共工程部副部长，刚从书店出来。“让，”他叫我，“我想请你为我在你的书上签个名，但是等候签名的人排起了长队，我可等不起。”另一次，也是在渥太华午餐时间签名，排队的人延伸过两个街区，直到马尔罗尼总理办公室的窗口下。那天天气奇冷，一家餐馆给我的顾客们送来了一杯杯热汤。

在加拿大各地都出现过排长队买我的书的情况。我曾在安大略省的“保守城市”金士敦看见几百人排队等候买书。在哈利法克斯的书店里，《心中的话》一周内售完脱销。在夏洛特敦，两位该省保守党部长与其他购书者一起排队等候签名。我曾确信，在卡尔加里的签名仪式必定是糟糕的。但是，当我7时半用早餐时，有人告诉我，旅馆的客厅里已顾客盈门了。无论是在基特切纳或维多利亚，人们都对我格外友好，他们中许多人是为一睹名人或收集一个签名，但是更多的人花钱费时却是为了说声“谢谢你”。在人们很少对政治家怀有谢意的时代，我深深地被每个人的善意所打动。

第一周结束时，我的书已名列全国最畅销书的第七位；第二周时，名列第三。我与新闻界的朋友开玩笑说：“此书要想荣登榜首可不容易。这意味着要超过《李·艾柯克》和《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性生活》这两本书。”第三周，《心中的话》果然名列第一，而且保持了数月。

买书者自然是政界人士居多。我听说，有位颇有声望的政治家住院开刀期间，收到了他几位不同的家人送给他的4本《心中的话》。不过，我尤其陶醉于看到源源不断来找我的各方人士，他们中间有老有少，有知识分子和劳工大众，也有莘莘学子和家庭

主妇。一次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市，我遇到一位男士，他打着一鲜艳的红领带。我以平常热情的方式祝贺他成为自由党人。“我不是自由党人，克雷蒂安先生。”他说，“但是，我是来告诉您，我希望您继续写作。我是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读了您的书，许多事情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清楚了。您具有把纷繁复杂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的才能。”

在过去，“才能”使得诸多知识分子恼怒于我。然而现在，当人们阅读此书后说，他们开始对修宪、权利宪章以及部长与文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所了解，我为此感到高兴。每个读者对此书都各有自己喜爱的章节：有些读者觉得我家庭背景和早年政治生涯的章节引人入胜；有的对我关于魁北克或商业界的论述兴趣甚浓；更多的读者对1984年戏剧性的自由党领袖选举尤感好奇。

我的宗旨是不把此书写成一部政治自传。我不想重提过去的政治斗争或挑起新的政治纠纷，相反，我想以一位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对加拿大政治进程阐发自己的看法。一个人不能企求太多，只要能在自己选择的职业范围内作出贡献就应聊以自慰了。政治是我的神圣职业，所以我将永远感激自己有机会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我自认为是从事此项职业的一个较好的人选。

自1984年10月《心中的话》初版至一年后平装本面世期间，我离开了联邦众议院，到私人企业工作。1990年我作为自由党领袖和反对党领袖重返政坛。1993年11月4日我就任加拿大总理。鉴此，我的出版商希望推出我的新版回忆录，以便加入平装本出版以来发生的事件。我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所有再版版税捐赠给蒙特利尔医学研究所。我利用圣诞假日与格雷厄姆一起对本书的引言和结论部分略作了些修改。

对我来说，政治始终是使我感到激励和挑战的持久源泉。我希望读者们在阅读这一最新版本时，能了解我在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欢乐，并从中有所借鉴。

我的政治生涯是来自各方众多人士长期帮助的结果。其中有

些人已在书中提到，另有许多人尚未提及。然而，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首先肯定他们的贡献。我们取得的成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在所有支持我的人中，莫过于我的妻子艾琳更忠实于我。她的意见显然有助于本书的构思。多年来，她对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爱护。我谨把此书奉献给她，聊表感谢之情。

076125

第一章

酷爱政治

我对政治一直很感兴趣。我父亲威利·克雷蒂安是肖维奈恩一家造纸厂的机械师，但政治始终是他热衷的嗜好。他是自由党的召集人，我很小的时候就帮他散发过小册子。1949年联邦大选期间，当时只有15岁的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弹子房为自由党而与人争论。18岁时，在我夏季打工的工厂餐厅里，我也曾与全国同盟^①的支持者们进行过较量。有的小伙子想让我给那些支持全国同盟魁北克省省长莫里斯·杜普莱西斯的老家伙们一点厉害，我这样做了而且仅仅是为了取乐。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这些家伙每天早起都要在杜普莱西斯的画像前祈祷。”老家伙们听了气急败坏，小伙子们觉得这是一场好戏。

我们家一直都带有红党色彩，是那种思想开放，反对教权，反对19世纪固有传统的自由党家庭。我祖父弗朗索瓦·克雷蒂安曾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自由党的组织者和圣埃蒂安·得湾村的村长，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在1896年大选中，他和米利特医生在选民中分发酒，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拉票方法。我祖父的岳父拉弗姆就为保守党干过这种事，这也是一种违反教规的行为。可是牧师赦免了我那支持保守党的太祖，却不原谅我那支持自由党的祖父和米利特医生。他告诉他们，只有三河地区的主教才有权赦免如此严重的罪孽。当时的主教路易斯·弗朗索

^① 是一个保守党组织，其时在魁北克省执政。——译注

瓦·拉弗什阁下是个热忱的保守党人，他在布道时总是强调，天堂是蓝色的，而地狱是红色的。^①那时，人们常常会因为具有主张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被革出教会。我祖父回答牧师说，他还没有那么重要，用不着向主教忏悔。这样，周复一周，整个四旬斋期间，全村人都看见村长和米利特医生在圣坛附近唱歌却不去参领圣餐，这在当时成为一大丑闻。

我可怜的祖母快气疯了，每天晚上她都为了倔强的丈夫而念经。复活节到了，可他还没改过，如果到下一个星期天他还不领圣餐，那他肯定得下地狱了。我祖母开始每天念三遍经。后来主教屈服了，他派弗朗西斯坎牧师来为我祖父和米利特医生忏悔。我父亲以此自豪，深以为荣。多年以后，当主教的名字从我选区（圣莫里斯—拉弗莱什）的名单中去掉时，我也很高兴。

我第一次遇见杜普莱西斯的时候，还是他的母校——三河学院的学生。每个人都被介绍给他，他听到我的名字就问我：“你是从肖维奈恩来的？”

我回答：“是的。”

“你父亲是威利埃·克雷蒂安？”

“是。”

“你祖父是圣埃蒂安·得湾村长弗朗索瓦·克雷蒂安？”

“是。”

“那你真是个可恶的红党分子。”

后来，我在魁北克城拉瓦尔大学学法律时，当上了自由党俱乐部主席。对自由党人来说，50年代后期的日子并不好过，事实上有点像1985年。迪芬贝克在渥太华掌权，杜普莱西斯则盘踞魁北克。当时的情况非常糟，以至于许多学生担心一旦被视为自由党人，就会失去政府资助的奖学金。我倒不太为此担忧，因为我拿的是私人赞助的奖学金，并且夏季在造纸厂有一份工作可以挣

^① 自由党以红色为标志。——译注

钱。另外，我不相信政府会剥夺我这点奖学金，政府也确实没有这么做。可我家很为我担心。此外，我在为自由党俱乐部吸收成员方面也遇到了困难。

在那个年代里，政治渗透到魁北克生活的各个方面。党派归属将决定你这个村能否得到一条柏油路；你这个组织能否得到举办一项体育活动的资助；你的餐馆能否得到售酒执照；你这所大学能否得到财政拨款等等。杜普莱西斯似乎是万能的，他的政敌，像皮埃尔·特鲁多，被革除教职，而警察对他朋友的违法行径却熟视无睹。腐败已成为那时体制的组成部分，大多数人不但欣然接受这种现象，而且还希望从中渔利。

杜普莱西斯曾对众人说：“我在帮助我的朋友。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

众人会回答他：“我们会帮助我们的朋友，莫里斯。”

罗马天主教会利用对人们行为是非功过的仲裁者地位，支撑杜普莱西斯的权威并成为他的工具。他和教会共同受益于保持魁北克人的贫穷、乡村化、不受教育，并顺从教会宣称的人生只是通往天堂的可怕历程。社会不是以普遍权利而是以特权为基础，服从与感恩成为人们思想的基本部分。甚至到1960年，我还和教区牧师干了一仗。他在每周布道时都主张对全国同盟保持忠诚，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网球场。一个好斗的青年律师请一位牧师在选举中不要多管闲事，这样做在我爷爷的年代就是令人反感之极的。也许我做的时候更令人反感，因为我曾用对着教堂的扩音器对他高声喊叫。

民族主义是杜普莱西斯封官许愿、政治腐败的另一种伪装。正如我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杜普莱西斯用魁北克省旗做裙子以遮掩他身上肮脏的部分。”另一方面，我父亲告诫我，北美法裔的生存取决于魁北克与加拿大结盟，他凭借着自己的经验看到了这一点。我父亲从未忘记过对法裔命运问题的关注，早年他与家人一起随大批魁北克人迁往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寻找工作。经济状况

改善后，他们又回到莫里斯。在加拿大境外，我父亲从未忘记过对法裔命运的关注，他是加美协会负责人之一，45年来这个协会一直致力于法裔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生存。他从马萨诸塞甚至从密执安订阅法文新闻周刊，并且了解路易斯安娜和美国西部法裔的历史。

在美国，法裔的影响已逐渐丧失并被同化，这与加拿大的情况形成戏剧性对比。因而我父亲总是把加拿大视为一个保护者。当然，他也意识到，法裔加拿大人在魁北克以外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曾为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如何生存与兴旺而担忧，但他从未因此而指责英裔。他的态度总是积极的，宁愿关注于未来，而不愿纠缠于既往。

我父亲在劳里埃时代变成一个感情强烈的加拿大人，他非常崇拜这位略带红党色彩的自由党人。当自由党人推广新国旗时，我父亲说：“劳里埃说过，我们会有一面加拿大旗，现在有了。”他骄傲地为每个孩子买了一面。后来他还曾代表我到我的选区内各村参加升旗仪式并发表简短的爱国讲演。

同样的爱国主义使他在二战期间成为莫里斯少有的几个支持征兵者之一。许多法裔加拿大人觉得那是欧洲人的战争，他们不应卷入。回想起来，那似乎是个错误的判断。但在当时，和平主义者的论调很强烈，特别是在美国不愿卷入而法国业已投降的情况下。我父亲认为加拿大应该参战，盟国应坚持战斗。他不仅在征兵问题的公民投票中投了赞成票，而且觉得说服儿子们义务参军是他的责任。两个儿子没有被军队接受，一个因为是医生，另一个因为视力太差，而第三个被录用了，成为炮兵上尉。我父亲为能在我家窗户上贴一颗星以显示这家有人参军而深感欣慰。作为一个小男孩，我曾经常将一包包食物和衣服寄送给我哥哥。我们家的经历与其他家庭不同，我们家反潮流的意愿，可能有助于我形成贯穿整个政治生涯的态度。

尽管我对政治的卷入始于乐趣，只是作为一种智能练习，但

我开始懂得政治可以作为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例如，有一次我在魁北克组织了一次要求民主的学生大会，大约50—75名学生想要到立法机构旁听席向议员们散发小册子。可是，有人泄漏了这一计划，因此，当学生们到达旁听席时，警察人数比学生大约多一倍。我想大概有几个人喊了一两句口号，而其他的人则吓得不敢动弹，最后一事无成，铩羽而归。

另一次是我直接向杜普莱西斯本人提出抗议。在法学院的第一年，每个学生都要有一本魁北克法令修订本。如果你是全国同盟的支持者，就可以到格兰德·阿里街的文艺复兴俱乐部去免费领取一本，那是为党员修建的一幢考究的老式石头建筑。其他人则要付10加元，这似乎很不公正，因此我和一个朋友决定去向杜普莱西斯抱怨。我朋友也是自由党人，但他出身于三河一个老式律师世家。他父母与杜一家熟识，杜普莱西斯的秘书认识我朋友的母亲，也认识我家人，因为我祖父是杜普莱西斯选区的自由党召集人。

我们对她说：“我们想见杜普莱西斯先生。”

她问：“干什么？”

“我们要提抗议。他能和我们谈谈吗？”

杜普莱西斯在议会大楼拐角的套间里接见了我们俩。这屋里到处是花和克里豪夫的画，显示出主人性格中追求美好事物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对悠闲时光、拳击和垒球的嗜好。尽管他来自三河的大家族，但杜普莱西斯被视为反传统政治家。他虽很保守，很虔诚，但特别爱开玩笑。

当然他和我们也开了不少玩笑。他的眼睛闪着光，块头不大却气势很盛。他为社会中没有权利只有特权的观点作辩护。他说：“如果你在读大学，那是因为你被授予了特权。”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坚持说只有支持全国同盟的学生才可得到免费书是不公平的。

杜普莱西斯说：“那是因为你们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那些学

生有信仰，而信仰会给人们以回报。但你们来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和你们做个交易，既然你们不愿意每人付 10 加元，那就两人付 10 加元，我给你们两套书。”

作为自由党俱乐部主席，我深深地卷入了 1956 年魁北克省选举，这是一次很激烈的选举。当时圣莫里斯选区的省议员是热内·哈麦尔。他是个伟大的演说家，曾于 1945 年被民众集团推举为参加联邦大选的两个候选人之一。民众集团是左翼政党，是 1942 年抗议服兵役时兴起的魁北克民族主义政党。1952 年哈麦尔当选为自由党省议员，作为反对党议员，他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致杜普莱西斯对他深恶痛绝。他们之间就像水与火那样不相容。杜普莱西斯曾到我们选区说：“如果你们选哈麦尔，你们将得不到你们想要的桥。”我在发言中这样回答他：“我宁愿游过河，但决不愿跪下去爬过河。”

那些日子里政治集会真多，每天晚上我、哈麦尔和一位名叫费尔南德·拉维涅的好朋友到选区各处发表演讲。拉维涅对我有着重要影响，他创建了肖维奈恩工会，并担任过多年该地的工会主席。他没受过正规教育，然而特鲁多说拉维涅是他遇见过的最有学问的工会领袖之一。他长得也挺帅，他与杜普莱西斯不和，故而辞去一份很好的工作，迁到萨斯喀彻温。尽管他说英语，但他那一大帮人谁都不会说英语。由于无法适应，他们只好又搬回来。1957 年联邦大选时他改换门庭，放弃了自由党，作为平民合作联盟候选人参加圣莫里斯—拉弗莱什选区的竞选。他干得不赖，我可能会选他，我记得我也为此而动心。

1956 年哈麦尔在竞选中获胜。1958 年在他与让·莱塞奇争夺魁北克自由党领导权的较量中，我帮助了他。虽然哈麦尔一直是个好党员，并偶尔有机会在即将离任的老领导乔治斯·拉帕姆生病时，代行自由党领袖的职务，但我们毕竟没有竞选资金。哈麦尔曾加入过民众集团，因而被视为是一个惹事生非的捣乱鬼。他在竞选中败得一塌糊涂，莱塞奇接着在 1960 年当选为省议员。那